

探访

# 从陶寺文化看“最初中国”

旅途

□ 高江涛 李斌

“

文明因素只有经历不断发展积累和汇集,达到一定程度才能形成较为成熟的文明。而根据一件件出土文物和遗存的“指证”,我们在陶寺看到了“最初中国、华夏主脉”

## 悠然柳陂

□ 兰善清

“

柳陂既古老又现代,既风生水起又月照花林



塔儿山下,巍巍古都千年煌煌



陶寺遗址示意图



中华民族的龙形象,最早可见于陶寺遗址出土的彩绘蟠龙纹陶盘。

家授时中心、北京古观象台、北京天文馆、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南京紫金山天文台等单位的15位天文学家基本肯定了该大型建筑为天文观测遗迹。

### “文、尧”扁壶溯信史

1984年,考古工作者在考古发掘中发现一篇壶残片,残片断在涂朱,扁壶壁上朱书两字,经考证其一为“文”,另一字被何努先生直接考证为“尧”。

□ 郝旭光

位于山西省的崇山,又名塔儿山,海拔1493米,南北延伸伸展10多公里,数千年来她似一位“母亲”张开双臂守候着脚下这片文明的土地。公元前2300至1900年,使用扁壶、肥足鬲的一群人生活在这里,他们不断发展壮大,创造了灿烂的文化,这些文化的基因,甚至传承影响至今。处于晋南盆地这一古老文化,被现代考古学家定名为陶寺文化。陶寺遗址就坐落于崇山向汾河过渡的黄土塬上,遗址面积可达400万平方米。作为陶寺文化的核心聚落,该遗址涵盖了陶寺文化早、中、晚三期。在其中期时达到鼎盛,修筑了面积达280万平方米的巨大城址,一座4000多年前的古代都城完美呈现。

2018年,陶寺考古工作已经持续了40个年头。首任队长张彦煌先生带领队员们对晋西南临汾运城盆地约8000平方公里范围进行了调查,发现了仰韶时代及以后的遗址306处,陶寺遗址就是其中一项。在苏秉琦先生“前聚落考古”思想指导下,陶寺考古队于1978年开始对陶寺遗址展开发掘。高天麟、高炜、张岱海等先生开始了第一阶段(1978至1985年)的发掘工作,确立了陶寺文化,构建起了年代分期序列;李建民先生随后接过队长重担(1993-1999年),继续对陶寺遗址开展发掘工作;梁星彭先生接任队长期间(1999-2001年),发现了陶寺城址并对这一宏伟大城进行了勘探和城墙解剖工作,确定了现在可知的大城时空分布;何努先生2002年接手陶寺队至今,厘清陶寺遗址性质、聚落结构、功能分区,确认了陶寺遗址史前时期都城的地位。

### 城郭之制示威严

无邑不城,古代陶寺人建立起了自己的城池。在陶寺文化早期,遗址已开始筑城。陶寺遗址东北部地势相对平坦的区域,四面夯土墙围起了陶寺宫城区,宫城区内已勘探出超过2000平方米的官室类建筑12座之多。目前考古工作的重心就是探索宫城区的建筑布局。宫城区以外东南附近为仓储区。继续向东南区域为墓葬区,第一阶段的考古发掘工作清理墓葬1300多座,且多数为早期墓,墓葬等级分明,应该为墓葬区。

至陶寺文化中期,陶寺城址开始大规模扩建,新建了约280万平方米的大城。这一时期,原来筑有城墙的宫城区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宫城”,陶寺城郭之制形成。整体上,城址内发现中期大城、中期宫城区、中期小城(观象台所处)、仓储区墓葬区和手工业作坊区。宫城区沿袭早期的宫城布局,考古队在宫城东部近墙部分勘探出面积达8000平方米的最大一处宫殿建筑基址,目前正在发掘这座大型宫殿基址。此外,在宫殿基址范围内出土了目前已最早的板瓦。陶寺城址在这个时期,面积达到280万平方米,一时风头无两。

陶寺文化晚期,宫城区废弃,城墙毁坏,陶寺遗址成为一般性的聚落址。

总而言之,陶寺文化早、中、晚期,特别是中期,陶寺遗址聚落发现了巨大的城址,地位崇高的宫城区、独立的大型仓储区、等级分明的墓葬区等。该遗址显而易见存在较大的等级分化和社会分工,表现出早期都城的雏形和特点。

### 王级大墓昭尊卑

公共墓地位于陶寺遗址Ⅱ区,共发掘墓葬1309座,均为长方形土坑竖穴墓,除很少的二次葬、屈肢葬外,一般是成人的仰身直肢葬,头向东南,排列整齐。陶寺墓葬分三类,抑或三等。大型墓9座,使用木棺,随葬品众多,有彩绘陶木器、玉石礼器和装饰品以及整猪骨架等,且墓主都是男性;中型墓尺寸略小,有棺,随葬之骨木玉石陶较之大型墓葬为少,多随葬猪下颌骨。这类墓葬死者多系男性。小型墓小而狭长,多数没有随葬品,此类墓为公共墓地的绝大多数。陶寺墓地等级差别非常明显。

陶寺墓地大、中、小型墓葬“金字塔式”的布局结构,亦当是陶寺文化社会结构的反映。族群成员间的平等关系早已打破,贵贱有别、高下有序的等级制度已经存在。处在金字塔塔尖的大型墓随葬品丰富、精致,有鼍鼓、特磬等重要礼器,墓主应是掌握军权、族权、神权的王者。而占墓葬绝大多数的小型墓,墓室仅能容身,死者身无长物,当是彼时的普通百姓。考古专家曾就“毁墓”现象做过研究,根据考古材料,毁墓现象仅发生在陶寺文化晚期,某一族群直捣早中期的王墓的中部和头端。政治权利斗争可窥一斑。

### 观象台上授农时

在陶寺中期小城之内考古学家发现了一处大型夯土建筑基址,其规模宏大、功能复杂,占地面积约1400平方米,台基形状为大半圆形,在台基上由13个柱子围成的半环形夯土柱列十分罕见。为搞清楚柱列是否为天文台,陶寺考古队及相关单位曾对该遗址进行过10多年的观测与探索。

观象台原理是从观测点通过柱子之间的缝隙观测塔儿山日出方位,从而确定季节、节气,安排农耕。通过多年实地观测与探索,发现从第2个观测缝看到日出为冬至日,第12个观测缝看到日出为夏至日,第7个观测缝看到日出为春分、秋分。2005年,在“陶寺城址大型特殊建筑功能及科学意义论证会”上,来自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国家天文台、国

甲骨文确立了殷墟的信史地位,实际上,殷墟甲骨文已经是较为成熟的文字系统,但同时认为在甲骨文之前还有一段很长的文字历史。殷墟文字刻于甲骨之上,得以传世,而年代更早的陶寺文字符号书写于扁壶之上而得以幸存。多项证据表明,文字草创于新石器时代晚期,是一定经济基础和文化进步的产物。陶寺遗址发现的朱书文字将汉字的出现至少推进至4000多年前,这是探索中华文明起源的重大突破。

### 鼓乐声声彰礼仪

墓葬中出土彩陶、漆木器、玉器、玉器或礼器组合,暗示礼制的初步形成。更值得关注的是乐器,所谓“礼序人伦,乐移风俗”,音乐是形而上的东西,代表了一个族群的文明进步程度。陶寺遗址出土大量乐器,包括鼍鼓、土鼓、特磬、陶铃、铜铃、陶埙、口弦琴等。陶寺遗址中共计发现类似乐器27件。其中,陶寺出土鼍鼓和特磬的组合一下从殷墟上溯了1000多年;陶寺出土的铜铃,是中国已发现最早的金属乐器。这些乐器的出土,对于揭示4000多年前的音乐发展水平,认识音乐与祭祀、音乐与生活的关系,探索礼乐制度的缘起和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塔儿山下,巍巍古都千年煌煌;悠悠鼓磬之声回荡绵长,昭示当初文明曙光;观象授时柱列存续四季,教导子民时令稼穡;圭影度量,定立天下四方……遥寄苏公秉琦,满天星斗,陶寺应否最亮一颗。

诚然,中国文明的起源与形成并非一蹴而就,她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只有文明因素不断发展积累和汇集,达到一定程度才能形成较为成熟的文明。

总之,陶寺王墓、宫城、宫室建筑等所体现的“王权”社会,各类精美玉器、彩绘陶器如龙盘、漆木器以及鼍鼓、石磬等礼乐器所反映的“礼制”文明,器类不一的铜铃、铜盆、铜壶、铜璋、铜璋、铜璋等等多件最早出现的“铜器群”,这些均与夏、商、周三代文明以及逐渐形成的华夏文明特质具有最明显的传承关系或一脉相承,是华夏文明这棵参天大树众多根脉中的“主”根。陶寺观象台以及王墓“圭尺”研究表明的4000多年前人们的“地中”观念,陶寺聚落形态研究表明的已进入社会形态的“国家”时期,这些使陶寺成为原始意义上“最初中国”。总之,可以说陶寺是“最初中国、华夏主脉”。

## 两千年后依然记着他

“

你知道“马革裹尸”和“老当益壮”这两句成语的由来吗?

广西防城港伏波文化园,是纪念东汉名将马援的露天开放博物馆。文化园以雕塑为主。从东向西入园后,正中是马援的巨幅雕像。将军马上凌云腾飞,面向南方,右临大海,左卫市区。园中雕塑除马援雕像外,还有表现马援南征、传播中原文化、建设祖国南疆的大型浮雕。谈到东汉南边的开疆拓土,不能不提马援。

汉光武帝刘秀麾下有助其统一天

下,中兴汉室江山的28员大将。汉明帝永平年间,明帝追忆当年随其父皇刘秀打下东汉江山的功臣宿将,命画师绘28位功臣的画像于洛阳南宫的云台,故称“云台二十八将”。按功劳马援应该在列,因其女时为皇后,汉明帝为避嫌没有列上马援,所以“云台二十八将”里没有马援的名字(一说马援非南阳嫡系从龙之将)。但民间戏曲唱词中有“云台三十六将”之说,其中有马援的名字。

马援字文渊,为消灭隗嚣割据、平定陇西,实现全国统一立下赫赫战功。汉光武帝建武十六年(公元40年),交趾叛乱。建武十八年汉光武帝加封马援为伏波将军,命其平叛。同年春马援赶到前线抵交趾浪泊,缘海而进,随山开道。十九年正月平叛大获全胜,二十年班师。

沿途修建郡县,参照汉律修订法律,治理城郭,凿渠灌溉,推广铁器牛耕,促进了岭南农业经济的发展,受到当地百姓欢迎和爱戴。伏波将军马援与其他东汉开国功臣不同,大半生都在“安边”战事中度过。马援为国尽忠,最终殒命疆场,实现了其“马革裹尸”的夙愿。

马援南征途经中国岭南广东、广西沿海地域,甚至包括越南的一些地区,后人以种种方式缅怀伏波将军,多地都有供奉马援的伏波庙。

马援的故事给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启示:真正能流芳千古的历史人物,要么是才华横溢;要么是文韬武略,功勋卓著,为国家统一和生产力发展、开化当地民智做出了巨大牺牲和奉献;要么是严谨自律、温良敦厚、清廉无私的楷模;或者

是三者兼备,体现了动机、能力和结果的统一,做的都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情。马援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伏波将军马援身负多谋善断、英勇善战、一击必得的军事才能,更有勇往直前、不畏艰苦的意志品质,为巩固边疆、开疆拓土、安定国家立下赫赫战功。他体恤民情的作风,宽以待人,严以自律、不居功自傲、廉洁奉公的胸襟,尊老爱幼、醇厚忠孝、乐善好施、慷慨解囊的大气,刚介耿直的性格,改革币制、教化当地民众的功绩,老当益壮、忠君戍边、精忠报国的精神和事迹,脍炙人口,流传千古。其慷慨名言为后世传颂,至今影响深远。伏波将军马援为促进岭南地区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为人们世代传颂。